

# 文学变成了统计学?!

文/何同彬

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,拒绝活在统计学的梦魇里几乎是不可能的,这比拒绝工作还要匪夷所思,甚至于你可以拒绝活着,但你拒绝不了统计学。比如作为大学老师的我,每到年末领取绩效工资,都需要填写大量的表格,这些表格最终都可以简化为统计数据。比如发表了多少文章;申请到多少项目;获得什么奖项……

因此,文学深陷统计学的灾难很难被定义为“丑闻”,既然一切都要在生产和消费的层面上考量,那把文学和文学主体数字化,是再自然不过的。很久以前,雅斯贝斯就宣告,技术和机器已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,其核心价值是生产和分配的合理化,这一合理化的实现不是依据于“本能与欲望”,而是依据于“知识与计算”。况且,就像波德里亚所说的,统计是一种实现欲望的形式,绝大多数个体都渴望得到统计数据形成的合理化的优越位置。

比如,多数作家都无法摆脱统计学的引诱,看看他们的简介或者“传记”就会明白,完全被一种数

字化的统计思维控制着,身份的确立和认同依赖于等级不一的统计标准;同样,统计学的引诱也即统计学的囚禁,作家们的焦虑也往往与统计数据密切相关。当然,学院学者就更是如此,在量化模式下,一切不能数字化的、超越于职业范畴之上的价值都是无效的,所谓学问因此不过是知识的一些极其封闭和丑陋的“简单再生产”,在它们身上寄托任何高贵和智慧的假想都将是愚蠢的。

在统计学形成的存在论里,人将消失,而数字立于不败之地,因为人早已经被规训为数字。而此时的数字,已经不是毕达哥拉斯(万物皆数)、柏拉图(造物主是数学家)、伽利略(宇宙是一部以数学语言写成的巨作)眼里那个形而上的、本体论色彩的数字,它服膺于资本主义的统计思维,变成了“葛朗台”、比尔·盖茨、巴特勒眼里的数字。这一切似乎难以抗拒,比如,如果在统计学的范畴内谈论文学是妄谈,意味着腐朽和堕落,那不在统计学的范畴内谈论文学呢?文学将消失,这和人的消失保

持着一致性。

马克·吐温说:“世界上存在三种谎言:一是谎言,二是该死的谎言,三是统计数据。”没有统计学就没有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但他在论述“机器和大工业”的时候明确指出:“不论在什么地方,想要不掺假的统计材料都是很困难的。”所以,本质上讲,统计学没有真假之分,信与不信,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;反正你只要活着就无法离开统计学,当然死后也无例外。

威尔斯(H·G·WELLS)多年前宣称:“统计思维总有一天会像读与写一样成为一个有效率公民的必备能力。”在一个全民拜金的大时代,这一预言已经提前实现了,我们的作家、艺术家们也早已和商人、政客一样,学会在睡觉前摘下面具,统计一下银行卡上的余额,然后做个好梦。

据统计……■

# 生命的颜色

文/威路

丽江到处都有花,长时间在城市蜗居的我,竟觉得是一种奢侈。丽江的花,有种高墙难挡花坚强的感觉,它们在屋檐上、路边都探出生命的颜色。如果只有花没有水,就少了一份心动。丽江的水流缓缓,有种“流水落花春去也,天上人间”的苍茫迷离。飘零的花瓣顺流而下,飘向一方,孤独和自在。

整整跑了两天后,我记得了一条条看似一样的巷子。很诧异,我在大城市几乎是路痴,但在这里,可以记得那些上上下下路边的花。我知道,花是一种生命的瞬间,也是一种姿态。时间流水中,万物都

有情。

那天半夜,我梦见自己听见花开的声音,就像儿子慢慢长大的痕迹。那天是儿子的生日,一早醒来,在这个陌生的古镇,花和水都变得遥远,而遥远的儿子却在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出现。我在微博中写道:一年前的今天,我百感交集又故作冷静地等待两个人。一个熟人和一个陌生人。如今,熟悉的和陌生的都已刻在生命烙印中。一年前的今天,我从别人手中接过来,那时,我想我的心并非是柔软得像一捧水,我甚至有些惊慌。今天在遥远的束河古镇,我才明白为

人父的心肠,可以如此牵挂,如此想把你重新捧在掌心,轻语一声“宝宝生日快乐”。因为140字的限制,我的情绪被限制了。不光是儿子,他的母亲也了不得。生日不仅是生命的开始,也是母亲的苦难,但这份苦难中带着盼望。这其实就像信仰中的真实,苦难中带来新生命,也带来至大美好的幸福。

夜晚的花朵都睡着了,宁谧的红灯笼高高燃起。繁华落尽一身孤独,歌声夜半半盏残烛。在这里,时间都静止了。■

# 寻找黄蓉妹子

文/张其全

最深入男人心的一本书是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吗?估计会引发不绝争议。但如果引众人痴迷“射雕”的原因之一是黄蓉,恐怕男人都会“YES”的。“满天花雨掷金针”等盖世武功,以及“五行八卦”等绝学之术自不必说,单凭黄蓉能心算出八位数字的三次方根这一手,就能入选“最强大脑”的中国战队。这风华绝代的女子偏偏爱上了木讷呆萌的郭靖,这无疑给平庸男人打了一剂强心针。连这种呆头鹅都摊上好事儿,俺为何不能?也许踏破铁鞋,还是找了邻家二妹子翠花。活腻时,偶尔向心中虚无缥缈的黄蓉致个敬,错不在普通男人,在于大侠金庸的成人童话也!

男人躬行的是一种现实的剧情,都曾渴望过成为离奇艳遇的主角。本人尚没婚配时,撞上一次稍微像点样的艳遇,确切说是遇艳。记得是夏日,我在金陵城箍桶巷等

101路公交车。朗朗的火炉天忽就下起疾雨,根本来不及找地方藏身。眼看就要成落汤鸡了,忽见一伞盖迅速移过来,非油纸伞,乃标配雨伞。一个女孩冲我喊:“过来,快过来吧!”那雨来去匆匆,我在伞下呆了不超过两分钟,和女孩三秒钟对话,实录在此。我说:“雨真大!”女孩答:“是的,雨真大!”这恐怕是没话找话说最经典的版本了。按说,这场景具备了言情剧需要的所有元素,如不发生点故事,当事男是应跳楼谢罪的。可惜真的没什么,就是一次平常的小帮忙,我连句“谢谢”都没时间说,连女孩长什么样都没注意看,就雨过天晴,各奔东西了。但这件事是我从酸涩文青变为现实俗男的拐点。从此我坚信,老夫我除了长相善良外,没有半毛钱玩浪漫的资本,于是老老实实苟活至今。

1992年我考场失意,去无锡

某厂打工。一段时间后向厂里告辞,却被扣着身份证不让走。老板的理由是:都这样想走走,厂子还不乱成放牛场。我几次向老板索要未果,气得牙根痒痒。正当我热血上涌,有了拎煤气包的冲动时,一个端庄娴淑的大姐看见了我。也许是我站在厂长室外,怒气太大,她过来轻声问:“你有什么事吗?”听了我的叙述,她皱皱眉,说:“你等会,我去帮你要!”一会,她从厂长室出来,把身份证递给我:“你走吧,把身份证装好了,不要搞丢了。”多少年后,我还能清晰无比地记得那个江南秋天的午后,我不知所措地站着,她仰着江南美女精致的瓜子脸,眼眸含笑,话语温柔。多少年来,每当我在生活丛林里杀得眼红时,总能想起那位不知名姓的大姐,总能完成把煤气包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灵魂救赎。■



静好 摄/王培

# 观前街上

文/李黎

古老板是著名书商,主编的期刊是十届高中学生必备复习资料。1999年,他应邀给我们上课,华丽转身,成了教授。正是在课堂上,我们知道了我们都是看着古老师出的书才进大学的,敬仰之情井喷。但敬仰飞快地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欢笑。古老师一口坚定不移的方言,配以动作,云里雾里,等明白后,因为其中字词转换的微妙和突兀,我们开心坏了。

后来,三五个同学充当古老师的翻译,一边在说,一边在翻译。这真是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以来中文系课堂上的奇观之一。

班上组织旅游,班长代表大家邀请古老师参加。天地良心,大家确实是想邀请他参加,而非买单。但当时古老师保持着自1992年以来一天赚到其他老师一年工资的强劲势头,一听“春游”二字,立刻安排车辆和路线,亲自带队,在一个周末的清晨把我们集体带到了苏州,我们都从了。

游玩的过程就是去著名景点,男生在喜欢的女生周围两米打转,女生们打打闹闹。当然,还有古老师,他热情洋溢地用方言讲解苏州历史文化,这使我们身陷两大方言的包围之中,真是到了绝对意义上的异地他乡。古老师游玩还有一大特色,那就是一个景观都不落下,哪怕只看一眼,这就是生意人的严谨。

晚饭后的节目是自由游览观前街。古老师把我们当街集中,叮嘱说,你们三四个人一组,务必要以小组集体行动。是啊,我们的初中

高中都是在书山题海里过来的,虽然已经大二,其实还停留在小学阶段,很多事情很二。

古老师说,马上分组。

于是大家分组。

古老师说,要有组长。

于是有了组长。

古老师说,组长过来!

组长向前一步走。

古老师喇的一声掏出厚厚一沓百元大钞,一只手平举着,另一只手飞快地在嘴里一蘸,飞快地点钱,然后一伸手说,给,拿去花,买点特产。

这超出了大家的理解和期待,我们看着古老师修长的胳膊修长的手和手里的一沓钞票不知所措,并且忽略了他此前掏钱数钱有多么麻利。第一个组长拒绝,他还没客气完,古老师说,不行,拿着,好好花,快。然后把钱塞到他手里,几乎同时,另外一沓钱已经到了第二位组长面前。十几位同学站在灯火辉煌、人来人往的观前街中央,在很短的时间里感受到了莫大的幻觉。无论观前街还是古老师,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繁华带来的幻觉。我们带着幻觉逛了一个晚上,都不敢去评论此事。很多年过去了,大家又一直在谈论此事。总结古老师的两大优点,一是有种有钱一起花的淳朴,二是有钱。

事实上,古老师给的钱大家都如数退还,但不菲的旅游费没人多提,大家普遍觉得,晚辈总该花掉长辈的一些钱。■